

被围困的教育 :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阶层生态

高水红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教育改革的困境与不尽如人意主要并不在于缺乏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改革蓝图,也不在于缺少懂得如何操作改革过程的教育精英,而在于教育所处的整个社会生态格局的复杂性。被围困其中的教育如果仅从自身完成彻底意义上的蜕变几无可能。其中社会阶层的分化趋势、社会阶层的结构固化、社会阶层的微观政治所形成的阶层生态格局对教育改革的内容、方向、立场与合法性构成了威胁,并形成了以单位保护、家庭投入、总体精英、关系资本等围困教育改革的途径,使得教育改革过程处处充满张力。

关键词: 教育改革;社会阶层;生态;阶层政治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24(2012)02-0021-06

不可否认,我们正处在一个教育深刻变革的时期,众多的教育问题被暴露出来,“学生负担过重”、“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教育价值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功利化”等等。与此相应,众多的教育改革文件相继出台,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等。从政策到实践,教育的改革理念与行动如火如荼,但是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诸多教育问题,而且仍然朝着人们不希望的方向发展。教育改革的困境与不尽如人意主要并不在于缺乏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改革蓝图,也不在于缺少懂得如何操作改革过程的教育精英,而在于教育所处的整个社会生态格局的复杂性,被围困其中的教育如果仅从自身完成彻底意义上的蜕变几无可能。这不是试图推卸教育部门自身的问题与责任,也不是将教育与社会人为地进行割裂,只是试图表明解决教育问题及实践教育改革,如果缺少对教育所处社会格局与生态的清晰把握和考量,任何意义上的教育改革都将会困难重重,甚至面目全非。

作为教育改革的背景存在的“社会”,显然已经不宜仅在背景的层面上去理解其力量和意义,社会的格局与生态左右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对于社会格局与教育改革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成为透视和把脉教育改革的必经之途。梳理当下教育改革的社会脉络与纹理有多个视角,社会阶层格局是不能绕开的一个。当前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明显,不同阶层的教育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不同或同一阶层之间在教育利益面前的联合与冲突变得更为显在和日常化。由当前阶层格局所带来的教育改革中的一些前所未有的、颇具时代性的特征正在显现,这些特征正在影响甚至围困教育改革的方向、立场、成效和进一步的推进。

一、社会阶层围困教育改革的现实格局

1. 社会阶层分化对教育改革的多元需求

尽管许多学者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趋势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中国社会阶层的日趋分化这一事实本身几乎达成了共识。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

收稿日期:2011-12-25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教育改革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学校教育过程的阶层化研究”[CAA100110]

作者简介:高水红(1978-),女,江苏海门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需求也变得多元,出现不同的教育需求在所难免,任何一种改革安排如果不考虑人们的需求,就会失去基本的动力和基础。在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排他性教育需求和差异性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

排他性教育需求的增长,有赖于教育在社会阶层地位巩固与流动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上层将教育的符号作为保持社会身份的象征,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巩固其身份和地位;社会中层将教育作为重要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他们需要通过下一代的教育完成阶层的跃迁;社会下层则更无需赘言,没有哪个阶层会像他们一样给教育负载如此大的希望。因此教育成为各个阶层争夺的领地,各个阶层千方百计让自己的下一代在教育中胜出,将其他人排斥在通过教育上升的通道之外。这种排他性的教育需求带来了过度化的教育市场,不管分属哪个阶层,在教育的重视与投入上都不会有丝毫含糊,对教育的需求几乎没有底线。不管自己孩子是否合适,反正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多内容、更高质量、更长时限、更优师资的教育成为每一个阶层的需求,近几年课外补习班的疯狂、奥英奥数奥数的疯狂就可见一斑。

差异化教育需求,有赖于不同阶层对教育的不同认识和定位。不管是针对校内还是校外,不同阶层对教育质量、教育取向、教育价值等等的认识并不相同,社会上层已经从“教育—文凭—职业”的关联中解放出来,对教育有着更高的追求,比如不满于学校教育的标准化转而去追求个性化的教育,也有不满于学校教育对分数等结果的过分强调转而追求注重过程的教育等;社会下层显然还没有能力将“教育—文凭—职业”的关联消解,因此更多情况下是被动接受现有的教育安排,同时更强调教育的有用性和职业化;作为社会中层,对教育的态度则较为暧昧,一方面他们需把教育作为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深感现有教育与自己所期待的教育之间存有较大差距,但尚无足够的力量超脱于“教育—文凭—职业”的关联,因此尽自己所有的资源和条件追求更高教学质量的教育成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如果说排他性教育需求更体现于教育的形式层面,那么差异化教育需求则直指教育的内涵层面。形式上的排他与内涵上的多元需求对教育改革而言都构成了不小的挑战。针对排他性教育需求所形成的教育市场是否形成了足够的规范和引导能力?规范和监督的主体是否明确?如何处理公共教育与市场化教育之间的关系?等等。至少从目前教育市场的混乱与盲目看,不仅是对公共教育体系的一种讽刺,也

是对教育改革是否迈出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一种刺激与挑战。针对差异化教育需求所形成的多样化教育价值定位,教育改革能否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机会保障不同家庭的教育选择权利?如果更深究一些,这种差异化需求不仅涉及教育机会,更关涉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评价甚至整个现有教育价值体系的改变,牵涉从观念到教育制度、招生制度等多层面全方位的变化,其挑战既具广度又不乏深刻性。

2. 社会阶层固化与教育改革的立场选择

如果教育改革选择以多头并进的方式,即谁也不得罪的姿态,直面不同阶层对教育的多元需求,在社会阶层日益定型化甚至固化的今天,这无疑又会触及当前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如何保证教育的公平性?

社会阶层概念所反映的本就是生活机遇的差异,生活机遇指的是在一个既定社会里,个人分享由社会创造的经济的或文化的机会^[1]。处于高位的人有较多的能力分享这一机会,而处于低位的人则只有较少或没有能力分享这些机会。阶层格局一旦固化,这种差异格局就会直接演变成各种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异,对教育机会和资源的获取也不例外。我们知道,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发挥双重功能:一是再生产原有阶层结构。自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一语道破“教育就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后,教育作为纯粹传授知识的漂亮外衣被剥离,而作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并使之合法化的重要机制的面目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二是为阶层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渠道。教育对于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曾经在功能主义的理论中得到特殊强调,被认为是社会分层结构趋于开放的基本动力,市场转型理论依照同样的逻辑,论证了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重要性在上升,对于社会分层模式重组具有重要意义^[2]。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依靠体制改革或结构变迁而引起的阶层流动已经基本结束,教育成为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3]。那么,教育究竟发挥上述哪种功能?这取决于社会中的其他条件与要素。

这里最关键的社会条件和要素就是国家的立场,作为教育改革的推动与倡导主体,实际也体现为教育改革的立场。如果国家选择站在中下社会阶层一边,那么教育将更侧重于发挥第二种功能,增加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从而增加社会的活力与公平,相反则进一步固化甚至加大社会阶层差距。在追求公平与满足不同阶层不同教育需求之间,教育改革的任何立场选择都会伤及某部分人的利

益选择前者意味着要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让教育中的优势获利阶层利益相对受损,这会增加教育改革的阻力,但对弱势阶层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选择后者原本是对教育的更高追求,但在阶层固化的语境中意味着让本来就处于教育弱势的阶层在争取教育利益的过程中更趋于弱势,这无疑是对国家和政府责任的一种逃避和推诿,对强势阶层而言也无非是锦上添花。因此究竟选择何种立场取决于国家现阶段的价值排序,它不仅考验着国家和政府在教育面前的能力和追求,也考验着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和良心。

3. 社会阶层政治对教育改革的合法性考验

如果说上述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对教育的围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几乎任何一个出现分层的社会都会遭遇上述问题,那么社会阶层政治则更具有地方性和文化性。阶层分化带来了阶层利益的分化,阶层内部对自身利益的认同与主动寻求变得日益自觉,阶层之间对相互利益的比较和计算也变得常态化,教育改革所要面对的正是这种阶层利益的清晰、分化与计较,在各阶层对教育利益的交换和博弈中,教育改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考验。

对于拥有强势资本的阶层来说,教育改革所遭遇的合法性考验主要来自该阶层对教育利益的寻求手段。为了寻求并满足自身对教育的利益诉求,该阶层群体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甚至不惜破坏教育的公正秩序。一方面通过已有的资本力量,或者与相关利益群体的资本交换,扩张自身的教育利益空间。众所周知,中上阶层不但在利益增量上远远快于下层和底层,而且在利益增益的渠道上远多于后者,在阶层的利益分化背后,还有具体的群体交换作为运作机制,既有阶层内部的群体交换,又有跨阶层群体之间的交换,构成了教育差距难以缩小的结构性障碍^[4]。另一方面该阶层有能力通过影响教育改革的进程将教育利益据为己有。我国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曾言:“改革在初期更具强烈的理想与热情的色彩,而现在的改革则更多地具有利益博弈的内涵”、“改革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正在形成”^[5]。教育改革中的强势阶层通过利益博弈在影响改革的进程,无论改革措施的立场是什么,在最后的利益结果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后期启动的教育产业化、扩招、并校等等,均成为服务于强势阶层利益和偏好的牺牲品。教育改革的目标与强势阶层的手段之间存在着扭曲,这种扭曲使得教育改革始终在“改革究竟对谁有利”的质疑声中

展开,教育改革想要大步向前且步履轻松变得不太可能。

对于没有任何可交换资本的弱势阶层而言,教育改革所遭遇的合法性考验来自于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教育利益排斥结果。从“起点处的教育机会”到“过程中的教育质量”再到“终点的教育结果和职业获得”,在强势阶层的全面挤兑中,留给弱势阶层的教育利益空间越来越小,本来指望通过教育改变已有阶层地位的文化目标与作为制度化手段的教育之间已经完全失衡,教育不仅没有帮助其完成地位身份的改变,反而成为其主要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对于中下层群体来说,教育由希望变成了谎言,对教育的全力投入变成了一个笑话。而这个谎言与笑话的形成过程正好伴随着中国社会最全面最热烈的教育改革过程,即便教育改革的初衷绝不是让教育成为一个笑话,但两者在时间上的巧合使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几乎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也使得继续进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和紧要性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目前教育改革颇为尴尬的局面:教育改革的动力不是以大众共同认同的改革目标和理念为基础,而是以大众对原有改革下的教育现实的不满和质疑为基础。这些不满与质疑的群体是社会中的相对弱势的阶层,这样的动力基础与群众基础,将使得教育改革“到底走向何方”以及“能走多远”成为伴随改革始终的问题。

二、社会阶层围困教育改革的可能路径

教育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转变是教育中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即“人人有学上”已经成为现实。“在考虑温饱问题的时候,人们主要是出于生存的需求,当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需要考虑如何‘牛逼’的问题了。”^[6]教育也同样面临人们需求的改变,这也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在当前社会,比起“有学上”与“没学上”的矛盾,“好学校”与“差学校”的差异所激化的人际、群体乃至社会的矛盾更为深刻。而在过去当人们为“有没有学上”的基本生存需求而努力时,对“好学校”与“差学校”的追求几乎是置若罔闻或是顺其自然的心态。

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从“温饱”转向“牛逼”,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此时社会环境已今非昔比,正如上述分析中提到阶层结构已分化甚至固化,且阶层政治已经形成,不同阶层群体想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追求“牛逼”已不太可能,而“牛逼”本身就关乎人们的能耐和面子,因此弱势阶层在教育面前的不公平感体认空前强烈,要求教育公平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

需要清楚：社会强势阶层是通过哪些路径将教育改革围困在公平的怪圈中无法自拔的？只有清晰了这些路径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突围的路。

1. 通过“单位”加固教育的结构壁垒

我们发现对教育利益的单位拥有和单位保护，以及单位参与下的对教育利益的争取、交换和博弈依然根深蒂固。一方面，一些拥有优质教育资源或能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说了算”的单位，其对单位成员的利益保护或照顾所形成的屏障是其他群体所望尘莫及的，比如教育系统内部的人员，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利益的享有权力。另一方面，一些握有强大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的单位可以通过单位间的利益互换而获得优质教育机会，比如政府部门（根据不同的地位等级），比如大型央企（根据资助的资金设备多少），比如银行、医院等（根据其提供各种便利的可能）而获得多少不等的优质教育机会配额。

中国社会严格意义上还是一个单位社会，虽然“单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包办职能开始逐步消解，但是由“单位”所形成的结构壁垒依然存在。所谓结构壁垒是指由社会机构、制度安排对特定群体所造成的限制、封锁与排斥。尤其是随着“单位”内部成员的同质化程度的提高，强势阶层成员通常集中在一些“好单位”，这些单位又反过来在各方面强化其强势地位和身份。通过单位关联强势阶层与教育利益的巧妙之处在于，单位是一种制度，这样的链接不再以个人的名义而是集体的名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其更隐蔽、更稳定、更常规化。只要单位存在，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存在，这种链接关系就不会中断。

2. 通过“关系”渗透教育场域

相比于“单位”这种制度化的方式，“关系文化”对于教育公平秩序的干扰更为根本和深远。关系资本是衡量中国社会阶层群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意味着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7]。显然处于不同阶层的行动者，他所能动用的资源，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存在差异的。假设家庭拥有再强的经济能力，但是教育的大门不会特别为他们敞开，那么社会中关于教育寻租的各种矛盾就会减少。但现实是两者之间不仅建立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正在不断被加强。这种联系将学校教育于不同阶层的各种资本关联起来，使得有强硬社会关系的人得到机会，无关系的人束手无策。这也印证了时下流行的“不是愿不愿意出钱的问题，而是看你关系硬不硬的问题”。教育变味成了家长之间社会

关系的较量。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关系文化、人情文化的社会土壤，“说句话”或是“递个条”在中国社会具有特定的分量，当行动者希望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时，他们多数会动用关系资本。加上社会转型过程出现的体制缺位所带来的灵活空间，使得关系网络在教育领域的运作过程中变得异常活跃。关系资本由“上不了台面”的潜规则操作变成了“明码标价”的显性考量，由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变成了“关系先行”的有力保障或必行之路。在这背后，隐藏着具有不同关系背景阶层的大量寻利行为，小到孩子座位的安排、班干的获得，大到孩子班级教师的配置、加分资格的获得等等，可以说关系资本对教育场域的渗透已经既广泛又深入。

3. 通过“家庭”加大先赋性地位的作用

随着体制改革后政府对教育的权力下放，政府对教育的垄断角色开始退场，给予教育领域更多的自由和空间，由来自自上而下的教育机会配给转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机会寻求。由此，家庭取代国家在教育机会的分配上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干预教育机会的获得，即在教育机会寻求、选择、获得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改变教育机会获得的规则，随着阶层分化加剧、居住社区贫富的分割明显，学校分布格局与居住区分布相互配套，暗合了教育机会分配的规则由“选拔”到“就近”的过度，原本为了追求公平而实施的“就近入学”改革将进一步强化家庭居住区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

通常而言人们倾向于接受因能力差异导致的教育机会分配差别，而无法接受因先赋性差异导致的教育机会分配差别。因此不管是直接干预还是改变规则都显得过于赤裸裸，家庭更为潜隐的作用发生在教育的过程之中。一方面家庭对教育的态度和认识、创造的环境和条件等都铺陈在教育过程的各个细节，随着漫长的教育过程的展开而发挥作用，这正是布迪厄所要指出的，看似公正合理的教育过程事实上完成了对家庭资本的转换^[8]；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由市场空间所创造的教育获得模式对家庭经济能力的依赖越发明显，处于不同阶层的家庭，由于经济能力的差异，在市场空间中获得的教育成就差异进一步加大。通过校内校外教育空间的转化，先赋性的因素被掩盖，转而让孩子以能力或学业的优势在教育竞争中胜出。

4. 通过“精英”完成庇护性流动

优质教育资源如果为某一部门或某一群体所垄

断,那么该部门及相关群体精英就可以把握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而人口的大多数则与机会无缘。这一垄断部门和群体可以通过制订或改变教育机会的选择标准、分配标准、推荐标准、加分标准、划片标准等等来或显性或隐性地操作教育机会。垄断程度越高,那么操作的自主性就越强、操作的封闭性就越高、操作的规范性就越差、操作所受的监督就越少,这是垄断带来的必然后果。对教育而言,优质教育资源一旦被高度垄断,教育即便可以促进社会流动,也不再是公开的“竞争性流动”,甚至都不是遮遮掩掩的“赞助性流动”,而只能是赤裸裸的“庇护性流动”。

所谓“庇护性流动”,是指对教育机会具有操作能力的群体或部门精英在制订标准、规则和履行程序时始终朝向或围绕对其子代有利的方向进行。一方面这种庇护性流动视其子代是否将面临上学压力而定,因此随着精英们子代的上学情况变化,教育改革的政策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使得地方性教育改革的标准、规则、程序具有鲜明的人为性、多变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如果教育改革的规则与程序不利于精英们的子代,作为精英可以完全超越自己参与制订的规则而另谋出路,换句话说,精英们自身可以不受规则制约。这使得教育改革的诸多文件、规则、程序等更多形式的意义。

三、教育改革的张力:“突围”的有限与底线

现有社会阶层生态围困下的教育所遭遇的最突出问题便是教育公平秩序的合理化。教育改革的理念与行动至少表明,人们朝向更好更合理的教育秩序的追求没有改变,但是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合理化教育公平秩序变得越发困难。虽然经济发展或现代化过程并不必然带来阶层差异的扩大,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态与分层趋势看,这一扩大步伐似乎有脱轨的危险。在这样的阶层分化格局与趋势面前,教育改革必然处处充满张力,往返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各种坚持与扭曲、规范与安抚、妥协与补偿,将成为改革行动的常态。

改革教育公平秩序在这样的张力中必然遭遇限度的问题。事实上,针对上述教育改革被围困的路径,不管是“单位制度”还是“家庭资本”,“关系文化”还是“精英群体”,都已超越了教育自身的领域,不能仅限于教育范畴来解决,它涉及社会文化和结构的全方位调整,教育被期望作为缩小或改变阶层不平等的重要功能看来要大打折扣。“中国的经验表明通过政策干预抑制较高阶层的教育诉求,以实现教育

分层最小化,不是一种最佳的政策选择,相反西方发达经济社会长期福利政策对于降低教育分层的作用,却具有一定的社会成效。”^[9]有研究者在分析了教育与阶层的关系后指出:仅仅在教育领域通过实行“补偿原则”向中下阶层倾斜教育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也无法根本改变中下阶层在较高教育阶段的不利状况,教育平等化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完善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缩小社会阶层的生活差异^[9]。教育公平的出路在教育之外,这多少有些让人觉得无奈和无力,这意味着围绕教育内部的公平化改革不是零敲碎打就是隔靴搔痒,教育公平秩序改革的有限性可见一斑。

虽然改革有其限度,但并不意味着真的无关痛痒,也不意味着毫无底线。改革的底线之一:改革过程中国家与政府能够超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之上,以相对客观中立的姿态合理化教育秩序。在哲学的探讨中,国家总是被寄希望于成为最后的和绝对的调节力量,国家体现着独一无二的公共意志^[10],因为需要依靠某种力量来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国家的关怀被设想为是全局性的,国家成为最后的仲裁者;底线之二:改革是否最有利于社会中的最不利阶层或群体,在现有阶层格局无法打破的条件下,罗尔斯的正义论之补偿原则看来是退而求其次的最好选择,也是最现实可行的选择,当资本与权力之光能够普照这些中下层群体时,哪怕只有微弱的一点光亮,也足以让其感觉温暖。在上述两个前提下,改革即便是取得有限的进步也是值得称道的进步。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学者已有多人对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作出自己的概括,如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观点(2003)、陆学艺等人提出的“中产化现代社会”观点(2002)、李强和李培林等提出的“碎片化趋势”(2004)、李路路提出的“结构化”观点(2003)。

中国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指出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标志主要表现在3个问题上:一是阶层之间边界的出现,二是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之间流动的减少和常规化。“观察目前我国的社会生活,这3个趋势已经开始在不同程度地出现。”(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动作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J].社会学研究,2003,(5):42-51.

- [3]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动作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4]王春光.快速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J].江苏社会科学,2007(2):108-116.
- [5]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6]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7]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8]P.布迪厄,J.C.帕斯隆.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9]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6):94-107.
- [10]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The Education under Siege : Stratum Ecology of Educational Reform Currently

GAO Shui-hong

(Center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Nanjing , Jiangsu 210097 , China)

Abstract : Educational reform is difficult and unsatisfactory currently. And the major reason is not lack of clear and convincing blueprint for reform or the elites who know how to operate the reform process , but the complexity of the whole social eco-pattern in which the education is besieged. So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education to transform completely only by itself. In the whole social eco-pattern , the stratum eco-pattern is formed by the stratification tendency , the structure solidifying and the micro-politics of social class. It's the stratum eco-pattern that poses the threat to the content , direction , stand and legitimacy of educational reform. Meanwhile , it forms the routes besieging the reform , such as the unit protection , the family investment , the overall elites , and the relational capital , etc , which make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reform full of tension everywhere.

Key words : educational reform ; social stratum ; ecology ; stratum politics